

# 薛松：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关系 70 年 中印尼关系的互动与变迁 3

上更加坚定地支持印尼。另一方面，英美对印尼的干涉压力持续增加，暗中支持“全面斗争约章”(Permesta)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革命政府”(PRRI)等地方叛乱。可见，印尼向中国靠拢大致有 3 个原因：一是中国支持印尼的解放事业，反对美国干涉其内政；二是苏加诺倚重印尼共产党制衡亲美的军人派系，而印尼共产党是沟通中国和印尼关系的桥梁；三是中国转变了对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更接近印尼“独立、积极”的外交原则。此外，1959 年前后印尼的政治制度变革使其在发展对华关系上面临的国内阻力有所减弱。自 1959 年 7 月，印尼实行“有领导的民主”，政党被削弱或遭解散，苏加诺总统的权力得到加强，在外交上可以更多地体现个人意志。由于苏加诺不欣赏赫鲁晓夫，且与印尼共领导人约多(Nyoto)私交甚好，因而更多地表现出交好中国的意愿。

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到“九州”事件，中印尼政治联系非常紧密。首先，高层互访频繁。1961 年和 1964 年，苏加诺两次访问中国。刘少奇主席(1964)、周恩来总理(1965)



加达轴心”。其次，两国在一系列政治问题上相互支持。中国支持印尼参与创立不结盟运动、解放巴布亚和“对抗马来西亚运动”，印尼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等。此外，中国向印尼提供援助，减轻印尼对美国的依赖。1958 年到 1965 年，中国援助印尼 2.15 亿美元，在当时中国对亚非民族主义国家的援助中居首位。最后，两国推动解决华人华侨问题。1960 年 1 月 20 日两国就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条约换文，印尼政府于 1961 年 8 月批准了该条约。

在紧密的政治联系带动下，中印尼的合作范围扩大，经贸和文化交流成果初显。1961 年两国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国援助印尼纺织和印染等成套工业设备。1965 年中

河》等歌曲在中国广为传唱。

## (二) 从外交关系冻结到意识形态之争式微(1967 - 1989)

1965 年“九州”事件后中印尼关系急转直下。1967—1976 年两国外交关系中断，以致一度处于彼此敌对的状态。苏哈托政府视反共为政权合法性之基础，对印尼共产党进行大清洗，从而得到了美国全方位的援助。中国则对亲美的苏哈托政府持否定态度，敌视印尼参与创立的东盟，坚持与“印尼共产党中央代表团”保持联系。两国在国内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上都没有相互妥协的空间。外交关系中断期间，中国在印尼的事务由罗马尼亚大使馆代理，印尼在中国的事务由柬埔寨大使馆代理。两国贸易通过新加坡和香港转口。印尼国内外的华侨华人对维持两国的转口贸易和民间往来起到重要作用，也成为两国政府私下沟通的渠道。

1976 年前后两国关系开始缓和，中国“联美抗苏”和“不结盟”外交战略的转变以及周边及东南亚政策的调整，加上印尼政治形势的变化，两国关系逐步走向缓和。在“联美抗苏”“一条线一大片”外交方针的指导下，中国从打开中美关系大门走向中美正式建交，努力

团结周边国家对抗苏联霸权主义，反对越南在苏联支持下对邻国进行扩张，改善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相继与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建交，与新加坡开启友好交往，化解了中印尼复交的外部压力，中印尼紧张关系也随之趋向缓和。1979 年中国将发展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奉行不结盟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持续向印尼释放友好信号，态度坚定但不急迫。中国借参加 1980 年和 1985 年万隆会议纪念活动的机遇，表达了基于万隆精神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印尼复交的意愿。在印尼方面，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苏哈托政府从反共的意识形态后退，转向以经济发展成就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印尼致力于发展出口导向型加工业。为了突破欧美贸易保护主义、扩大出口市场、减少对日本的依赖和降低对华转口贸易费用，印尼工商界迫切希望发展对华直接贸易。此外，在这个阶段，苏哈托政府积极参与地区和全球事务，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发生联系，如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周边外交战略调整和苏哈托政权合法性转变 3 个积极因素的影响下，1976 年前后两国的紧张关系开始缓和。苏哈托总统在 1975 年表示，鉴于菲律宾、泰国陆续和中国建交，印尼也准备改善对华关系。1978 年 3 月 11 日，苏哈托公开表示准备与中国复交。然而，中印尼从双方表达复交意愿到关系正常化经历了漫长的十余年，主要原因是印尼政府面临较大的国内阻力。印尼军队和伊斯兰团体等仍认为中国是威胁，对复交有 4 重忧虑：第一，

担心共产主义在印尼复苏。印尼认为中国在“九州”事件中支持印尼共产党，希望与中国澄清此历史问题，以不再担忧中国会干预印尼内政。第二，担心对印尼经济的冲击。政商界精英害怕发展对华贸易会冲击国内产业，也担心中国利用华人及其资本控制印尼经济。第三，担心华人效忠中国。军队和安全部门怀疑印尼华人对中国保持政治忠诚，也担心与中国复交在印尼国内引发排华事件。第四，担心中国在东南亚的战略意图。印尼军方认为 80 年代后期中国对南海的声索威胁到印尼海洋边界，不愿与中国接触。但印尼外交部认为正因为不确定中国的意图才需要接触中国并用多边机制来约束中国。

由于国内阻力较大，苏哈托政府只能先从不敏感的经贸领域推进与中国的关系。两国在 1985 年恢复了直接贸易。1987 年中国国际贸促会代表团与印尼产业代表在雅加达举行 20 多年来的首次贸易研讨会。印尼工商总会 1988 年再次访问中国并参加 1989 年北京国际贸易博览会。80 年代末，印尼军队和伊斯兰组织的政治地位被削弱，苏哈托独揽大权，能抵消国内反对与中国复交的声音。

一时期，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也积极努力，采取措施推动与印尼一起放下历史包袱，修复双边关系。1989 年 2 月苏哈托与钱其琛在东京举行会谈，就复交的原则性问题达成一致意见。1990 年 8 月 8 日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在中印尼复交过程中，一如在推动发展两国经贸关系时那样，一些华人华侨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桥梁作用。

未完



、陈毅外长(1961、1965)先后出访印尼。因高层和民间来往密切，两国关系被西方称为“北京—雅

国成为印尼第二大贸易伙伴。1961 年两国签署了友好条约和文化合作协定，许多印尼文艺作品进入中国，《星星索》《梭罗